

中山大学政治学丛书④

Modern Politics and
Classical Tradition

现代政治 与 传统资源

肖 滨◎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山大学政治学丛书④

Modern Politics and
Classical Tradition

现代政治◆传统资源

肖 滨◎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政治与传统资源/肖滨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

(中山大学政治学丛书)

ISBN 7-80109-840-4

I. 现…

II. 肖…

III. 政治理论—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973 号

现代政治与传统资源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 com. cn

E - mai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泽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1.375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总 序

如果把编撰、出版这套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视为我们的一种学术志业选择，那么，激励我们进行这一选择的理由有三：

其一，接续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时，即将1905年广东开办的法政学堂纳入其中，并设立政治学系，这一学科建制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才告中断。从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大担任教职的不仅有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邓初民和著名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张君勱先生等人，而且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政治学、行政学教授。在一份由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提供的1932年至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的资料上，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政治学、行政学前辈的名字，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胪列其中几位：

——邓孝思，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治学说、政治学史。

——詹显哲，政治学系教授，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兼政治经济科，主要从事国家学、国际政治、政治史

的研究。

——刘永南，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毕业，主要从事各国政党论、地方自治的研究。

——邱昌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地方自治的研究，著有《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等。

——范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主要从事宪法、行政法的研究。

——梁贞，法国国立第戎(Dijon)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政学、行政学、民族运动史的研究。

——胡汉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自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梁朝威，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现代政治思潮的研究。

——蒋竹林，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各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

以上只是从一份简略的档案资料上获取的信息。不过，由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仔细的收集、发掘和整理，一定可以再现出一个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那将是一个浸透了前辈学子心血的历史传统。可惜，这一传统因 1952 年全国的院系调整而随风飘散。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老一辈著名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王乐夫教授的领导与努力之下，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才得以获得恢复、重建，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在走向 21 世纪的今天，如何在先前学者努力的基础上，

延续学科的历史传统，承接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是值得后生学子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大问题。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视为我们对此问题交出的一份远远没有结束的答卷。

其二，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对政治漫长的经验和长期的思索中，逐步形成了一门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知识系统或者说一门科学：“在‘科学’一词的广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掌握和组织的信息和理论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这种知识也是积累而成的。”（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上卷），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1页）

正视或者面对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我们确实需要反对以下三种观点：其一，古人对它无所不知，我们只能借助和吸取他们的智慧；其二，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惟一方法是摆脱过去的羁绊；其三，政治学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它纯粹是本土经验积累的产物。这三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在于：第一种观点封杀了政治科学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的必要性，意味着政治科学知识之树上再也不结新果；第二种观点破坏了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其结果是政治科学知识之树的根被彻底挖断；第三种观点否定了政治科学知识跨国界交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政治科学知识之果沦落为不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土特产”，从而最终失去知识的价值和品格。毫无疑问，对政治科学知识系统的发展而言，这三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

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100多年前，目睹19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以上引文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9页）

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丛书正是我们作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

小的一步。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丛书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位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丛书将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

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3年11月

自序

如果把出版自己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视为向读者提交一份答卷，那么，说实话，我原本不打算这么早地交出这份答卷。究其原因，其实是一种学生心理：总感觉答卷完成得不理想。然而，正如学生最终不得不向老师交卷一样，我也只好借助一个难得的出版机会，把自己近10年写的一些论文、评论奉献给读者，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和指正，同时也是对关心和帮助自己的老师、学生和朋友的一个交代、一种感谢。

本书收集了21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之所以写作这些论文、评论，大致基于这样几种原因：一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举例来说，《立宪设计者心目中的个人、社会和国家——以“普布利乌斯”为例》就是为了参加2003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上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会议论文。这种会议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二是平时的教学、读书、思考，比如《走出高调民主的乌托邦——评〈顾准文集〉》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我初次研读《顾准文集》所留下的记录；三是报刊杂志的约稿。最近写的那篇短文《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读〈辩论——美国制宪

会议记录》》就是应《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的多次约稿于今年国庆假期间写成的。（虽然该文的清样都已经排好了，但最终还是被该报总编大笔一挥勾销掉了；它无缘刊于《南方周末》，编入我自己的论文集总是可以的吧？）

上述各式各样的写作原因决定了我一开始不太可能有一个系统的写作计划和通盘的出版考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选论文、评论在内容和主题上完全是零散或者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紧密的学理联系。因此，经过忍痛割爱的处理和认真细致的筛选，最终我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每篇以两个关键词作为篇名。上篇为“立宪选择与复合共和”，由6篇文章组成，它们都是最近两年的作品，集中体现了我目前的学术旨趣；中篇为“自由民主与传统资源”，包括9篇文章，内容涉及殷海光、顾准、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以及自由民主与儒家传统的关系；下篇为“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理念”，一共6篇文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历史使命、价值关怀以及政治语词/概念的分析、澄清构成了本篇的主要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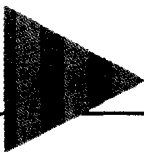
在书名的选择上，我最后把它定为《现代政治与传统资源》，如此确定书名，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它基本上可以概括我近10年思考、研究的主题，同时它大致可以包含全书的主要内容；二是它可以与我199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构成某种连接和呼应。

当我编完这本小书的时候，翻开日历一看，2003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新年的钟声似乎已从远方隐约传来，对于我自己来说，新的一年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1984年的秋天我从长江上游的江城来到珠江之滨的中山大学读书、工作，到2004年我已在中大美丽的校园里生活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的岁月里，我走完了硕士和博士两个求学阶段，也从学

生转换为教师、从青年步入了中年。时间的流逝不仅意味着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许多事情上自己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而选择机会减少的结果则是别无选择。人生历程中的别无选择或许也是一种选择，但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可能是选择的最终确立和人生的某种定位。从这一角度来看，以教书、读书、思考、写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活动不仅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也是自己不可改变的职业选择。把这种职业选择视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天职”可能有矫饰之嫌，然而，对业已选择的学术活动保持几分敬畏之心却不能说是多余之事。

肖滨

2003年11月30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总 序 /1

自 序 /6

上篇 立宪选择与复合共和

立宪选择中的理性解释3

——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的分析

立宪设计者心目中的个人、社会和国家21

——以“普布利乌斯”为例

立宪设计中的价值整合与复合共和45

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62

——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在约法之下71

——《创世记》与《出埃及记》的政治哲学解读

公民政府：拒斥无政府与利维坦92

——洛克政府理论的逻辑结构分析

中篇 自由民主与传统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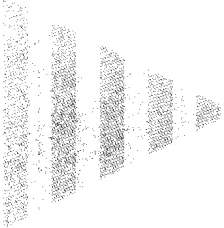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115

——以殷海光思想的演变为例

走出高调民主的乌托邦	131
——评《顾准文集》	
为自由主义传统定位	150
——兼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157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	168
——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在民主与宪政之间	183
——对徐复观权力观的理论定位	
徐复观重构儒家政治文化的三个层面	197
文本解析·历史把握·传统转换	220
——对徐复观解析《春秋繁露》的扩展研究	
君子之道	236
——郭店竹简《六德》、《五行》合说	

下篇 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理念

知识分子、自由之道与开放社会	249
知识分子与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	267
社会公正：道德建设之根	283
——从罗尔斯的思路与话语出发	
政治科学中的概念引入问题及其解决过程	291
把脉民族主义：90年代的讨论	307
理解公共领域：文本与导读	316



上 篇

立宪选择与复合共和

立宪选择中的理性解释^①

——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的分析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过三个假设：一是政治科学是研究政府的，二是政府是由人类设计和选择的，三是这种用来说明治理界限与条件的选择层次是一种立宪选择。他认为，立宪选择层次的分析与政治理论密切相关，它涉及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基本政治理论问题：为什么人类要求助于政治制度；什么样的选择是有效的；各种可选择的可能性方案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些可能性方案中作出选择的标准是什么。^②本文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在立宪选择的可能性方案中作出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进行讨论，力图证明基于严密的选择逻辑和坚实的政治科学知识而对立宪设计方案给出的理性解释是人民作出立宪选择的基本标准或者条件之一。

①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被遗忘的传统：宪法层次的分析》，载迈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毛寿龙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91页。

一、立宪选择中的理性根据及其理性解释

《联邦党人文集》一开篇，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①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其实质是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问题：如果说通过暴力或者偶然的机遇来建立政治秩序是以往人类历史的两大基本模式，那么，能否有第三种模式——基于深思熟虑的自由选择？^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良好的政府就是人类设计与选择的产物。问题是，什么是良好的政府？设计与选择一个良好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假设良好的政府是一种在规则的统治之下或者说受到规则有效约束的政府，而“宪法可以界定为是一组具体说明政府界限和条件的规则集”^③，那么，设

-
- ①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页。
- ②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丹尼尔·艾拉扎(Daniel J. Elazar)分析过这三种政治社会起源模式的不同结果：诉诸暴力征服极有可能形成权力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其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的统治；依靠偶然的机遇可能会产生一种中心—边缘的组织结构，其权力从单一中心向边缘扩展；基于自由选择的约法(covenant)，政府组织有可能成为不同于金字塔或中心—边缘结构的矩阵模式(the Matrix Model)，其权力将受到制度安排的约束。参见 Daniel J. Elazar. *Covenant and Polity in Biblical Israel: Biblical Foundations and Jewish Expression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pp. 35 - 40。
- ③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